一名作家。

很多年以后，刘震云在北大的演讲中，用幽默的方式，回应了当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：“北大教给了我做人的态度，有多大的胸襟、气度，就能做出多大的事情。作为北大的学生，要锻炼自己眼睛的宽度和深度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承担知识分子探照灯的责任，活在当下的同时，能清醒地去考虑民族的未来。从我进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天起，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，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。我有悖于老师的教诲，却想说，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，但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，对他的路能走多长，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上图：从河北燕郊开往北京的公交车。

摄影 / 王敬

北京的外地人

刘震云有了铁饭碗的工作，变成城里人，拿到北京户口本，分到了房子，生了女儿。在写作上，他也冲出困境，接连不断发表作品，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《东方之子》。这一切，在老家人的眼里，算得上是鲤鱼跳龙门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离开大学走入职场，刘震云把真实的自我藏起来了。经历了几年军队的历练、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，他变得老成，外表平易近人，“见人不可露真心，凡事必须话留几分”，把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藏在了内心世界里。老家人到北京办事，觉得他都能够帮上忙；其实，对刘震云来说，进报社当记者，远没有老家人想的那么风光。

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刘震云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。李书磊在一篇文章中感叹：“震云则无疑是一个得道者，他看社会一下子看到骨头里如庖丁解牛，他对人自身深刻的蔑视表达出来却是那样地轻松而从容……他看得很透反而除去了包袱，能够轻装投入，在‘一地鸡毛’的生活中游刃有余；但他同时又能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有一种反观，并把这种反观容于小说。”

凭着个人的生存智慧，工作几年后，刘震云调任副刊部当了正处级的部主任，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。和他写的小说《单位》《官场》《官人》中主人公们费尽心机想升职不同，刘震云轻而易举地当了官，在这个位置上游刃有余。

同事回忆，“家乡的人们重视职务，过去看他多年在外只混到个‘青年作家’，看不起他。如今开始刮目相看了。但是单位的一些同事则认为，一位有了相当影响的作家在这些‘俗务’上花费工夫，有点得不偿失”。刘震云回答同事的疑问，“没啥影响，王蒙开完会，马上可以坐下来写小说，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心理调节能力。再说每天写字不过几个小时，我也不必故作特忙，既然领导让干，那就干吧。要么不做，既做就要好；不求数量，但求质量，出影响，同我写小说的路子一样”。

刘震云在《农民日报》写过很多报道，编辑过的版面，因为年代久远，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了。但他策划的一个名牌专栏《名家与乡村》，当时邀请了几十位名作家为这个专栏撰稿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直还在，变成了《农民日报》的拳头产品。今年1月份，这个专栏发表了刘震云撰写的《延津与延津》，在这篇散文里，刘震云再一次回顾、解答他和故乡和文学世界之间的关系。“故乡延津作为一个地名，频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。为什么呀？是不是跟福克纳一样，要把延津画成一张邮票呀？这是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。我的回答是，我不画邮票，就是图个方便。作品中的人物，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；作品中的故事，总要有一个发生地；如果让这人的故事，发生在延津，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汤，羊汤，羊肉烩面，火烧……都能顺手拈来，不为这人吃什么发愁；还有这人的面容，皱褶里的尘土，他的笑声和哭声，他的话术和心事，我都熟悉，描述起来，不用另费脑筋。”

对刘震云来说，生活无处不在。